

莫迪治下印度气候政治叙事： 一种“印度式现代化”的诠释^[1]

赵 斌 马沙沙 李俐璇

【内容提要】莫迪政府执政以来，通过一系列战略发展规划，使印度现代化驶入快车道。其间，《巴黎协定》诞生以来印度气候政治衍生出国际、国内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在国际层次，印度的气候外交更为积极灵活、国际气候合作双多边成就瞩目、对外气候援助增强；反观国内层次，能源发展状况与实现脱碳目标两难、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引发环境争议和生态失衡、农业现代化造成污染严重、政府对环保组织施压。综合来看，叙事根源在于：在长期执政的基本政治诉求下，追求“印度式现代化”，气候治理让位于“印度式现代化”短期经济目标，并借气候议题实现印度的“领导性强国”战略目标。印度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如果不能调和“发展 vs. 治理”的矛盾，恐将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亦不利于“印度式现代化”之长远发展。

【关键词】莫迪政府 印度 气候政治叙事 气候治理 “印度式现代化”

【作者简介】赵斌，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沙沙，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李俐璇，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4) 01-0155-28

[1] 本文得到第二批陕西省“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类）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TZ0275）资助。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一、引言

印度正在经历全球气候变暖的“新异常”——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历史上最温暖、最潮湿、最干燥的气候变化。2022年，印度有314天经历了极端天气事件。^[1]这意味着印度的某些地区几乎每天都发生热浪、寒潮、飓风、闪电、暴雨、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极端天气事件，这折射出其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作为世界上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以来，印度日渐活跃于国际气候外交舞台，并关注气候变化对本国发展的影响。2014年，印度人民党（BJP，简称“印人党”）在印度大选中获胜，其总理候选人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就任印度总理。印人党曾在竞选宣言中公开表示，“我们将认真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举措，并与国际社会合作”。^[2]莫迪执政之初，先后出台了“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智慧城市”“技术印度”等战略规划，希冀通过深化经济结构改革、实施新的发展战略来加速印度的现代化。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简称《巴黎协定》）诞生，几乎与此同步，印度莫迪政府的外交叙事亦不乏绿色、可持续话语。2022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莫迪发表讲话表示，印度的重点是实现未来25年“清洁、绿色、可持续、可靠”生长期。^[3]可见，使印度的现代化朝向绿色低碳发展，是莫迪治下印度气候政治叙事的应然诉求。

然而，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2021年，印度排放

[1] Rajit Sengupta, “3,026 People, 2 Million Ha Crops: How 314 Days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ffected India in 2022,” Down To Earth, January 17, 2023, <https://www.downtoearth.org.in/news/natural-disasters/3-026-people-2-million-ha-crops-how-314-days-of-extreme-weather-events-affected-india-in-2022-87181>.

[2] BJP, “BJP Election Manifesto 2014,” Bharatiya Janata Party Central Library, 2014, https://library.bjp.org/jspui/bitstream/123456789/252/1/bjp_lection_manifesto_english_2014.pdf.

[3] “India’s Growth in Next 25 Years Will Be Clean, Green, Sustainable and Reliable: Modi at Davos Summit,” The New Indian Express, January 18, 2022, <https://www.newindianexpress.com/nation/2022/jan/17/indias-growth-in-next-25-years-will-be-clean-green-sustainable-and-reliable-modi-atdavos-summit-2407885.html>.

二氧化碳当量 (GtCO₂e) 达 39 亿吨, 约占全球总量的 7%。^[1]2022 年, 印度位居全球污染最严重国家第八位, 世界污染最严重的 20 个城市中有 14 个来自印度^[2]; 在 180 个国家的环境绩效指数排行榜中, 印度从 2014 年的第 155 位下降至 2018 年的第 177 位, 2022 年更是直接垫底 (第 180 名)。^[3]2023 年 4 月, 印度以 14.286 亿人口超越中国, 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人口激增亦导致印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跃升。同时, 莫迪执政以来, 环境法规、环境评审、专家咨询等制度机制却被视为阻碍发展进程而逐步遭到印度政府的限制甚至废除。例如, 印度环境部发布的《2020 年环境影响评估 (EIA) 通知草案》, 以法律背书, 允许工业项目扩张无需事先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公共评审, 这种“事后清理”的做法无异于打开了“违规闸门”。当下, 印度仍面临着艰巨的减贫及发展任务, 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加快, 印度的现代化必然又是一个碳密集进程。

从相关研究动态看, 印度因其人口规模、经济体量、气候脆弱性、国际承诺和能源需求等多方面因素, 一直是全球气候治理研究难以回避的主角之一。学界关于印度气候政治的相关研究视角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 国情决定论。认为印度气候条件不佳, 严峻的气候变化现实是印度制定气候政策的主要动因, 而减贫压力及油气资源禀赋不佳又导致印度气候行动迟滞。^[4]第二, 利益导向论。认为印度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需求和长期利益,

[1] “Emissions in India—Statistics & Facts,” Statista, December 19, 2023, https://www.statista.com/topics/8881/emissions-in-india/?kw=&crmtag=adwords&gclid=EAIaIQobChMI4KTMhPfygAMVkdMAh3FYgpeEAAAYASAAEgIhKvD_BwE#topicOverview.

[2] “14 of Top 20 Most Polluted Cities in the World from India,” Hindustan Times, June 6, 2023,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news/most-polluted-cities-in-the-world-india-pakistan-bangladesh-iran-iqair-101686047650288.html>.

[3] 环境绩效指数 (EPI) 由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发布。EPI 使用 11 个问题类别的 40 个绩效指标, 对 180 个国家的气候变化绩效、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进行排名。参见 Martin J. Wolf et al., “2022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Yal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Law & Policy, 2022, <https://epi.yale.edu/downloads/epi2022report06062022.pdf>.

[4] 黄云松、黄敏:《浅析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载《南亚研究》2010 年第 1 期, 第 65—77 页; 时宏远:《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载《南亚研究季刊》2012 年第 3 期, 第 88—94 页。

其中发展利益、能源需求 / 安全、粮食安全、资金技术、国际领导地位是主要考量。^[1] 第三, 国际驱动论。即国际规范和压力形塑了印度气候政治, 由此引发印度气候行动的反馈与回应。^[2] 第四, 双层互动论。认为印度的气候政策基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的共同作用, 且气候政策往往被嵌入到外交、发展等更广泛的议题之中。^[3] 第五, 南北分歧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于气候变化责任的分歧, 影响到印度气候政治的基本立场及其参与目标、决心、意愿、方式。^[4]

现代化建构着一国的气候政治, 它通过影响物质世界从而为人类社会引入了生态威胁和气候风险。^[5] 学界对印度现代化研究起步较早^[6], 较多侧重于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视角进行探讨^[7], 也揭示了阻滞印度现代化

[1] 金莉苹:《印度莫迪政府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 动因、成效与制约》, 载《南亚研究》2018年第3期, 第89—109页; Navroz K. Dubash, “Safeguarding Development and Limiting Vulnerability: India’s Stakes in the Paris Agreement,”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limate Change*, Vol.8, No.2, 2017, p.444。

[2] 程晓勇:《国际气候治理规范的演进与传播: 以印度为案例》, 载《南亚研究季刊》2012年第2期, 第26—32页; Sarang Shidore and Joshua W. Busby, “What Explains India’s Embrace of Solar? State-LED Energy Transition in a Developmental Polity,” *Energy Policy*, Vol.129, No.C, 2019, pp.1179—1189。

[3] 张锐:《印度清洁能源外交: 能源革命与大国战略驱动下的外交实践》, 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6期, 第139—153页; Aaron Atteridge et al., “Climate Policy in India: What Shapes International, National and State Policy?” *Ambio*, Vol.41, No.S1, 2012, pp.68—77。

[4] Himangana Gupta, Ravinder Kumar Kohli and Amrik Singh Ahluwalia, “Mapping ‘Consistency’ in India’s Climate Change Position: Dynamics and Dilemmas of Science Diplomacy,” *Ambio*, Vol.44, No.6, 2015, pp.592—599; Johannes Plagemann and Miriam Prys-Hansen, “‘Responsibility’, Change, and Rising Powers’ Role Conceptions: Comparing Indian Foreign Policy Roles in Glob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and Maritime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20, No.2, 2020, pp.275—305。

[5]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第96页。

[6] 陈峰君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南亚卷》,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7] Kanika Bansal, “Impact of British Raj on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India: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Princely States of India — The case of Mohindra College, Patiala,” *Journal of Creative Space*, Vol.5, No.1, 2017, pp.13—28; 李云霞、史纪合:《印度文化多样性初探》, 载《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4期, 第87—95页。

发展的现实因素。^[1]而整体上，关于“印度式现代化”之生态视角研究却相对匮乏，仅有极少数相关研究从微观出发，聚焦农业、交通、水电工程等现代化发展议程同生态问题的相关性。^[2]

国内外学界针对印度气候政治的研究较为丰富，但总体来看，学界对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气候政治的研究较侧重能源策略、能源外交等方向，缺乏整体性探讨。同样地，有关“印度式现代化”要素的讨论较为常见，但将“印度式现代化”嵌入到气候政治议题，或可能是新的学术增长点。毕竟，现代化作为一场深刻变革，推动着社会实现从落后向前瞻、进步、繁荣的结构性转型^[3]，而气候危机及其化解进程本身又内蕴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相互角力。^[4]因此，选取“印度式现代化”视角对莫迪治下印度气候政治叙事进行诠释，在理论上，有助于观察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和“治理”之间的张力，为全球气候政治研究给出某种新的样本或启迪；在现实中，可能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乃至发展中国家探索可持续现代化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经验参考。

[1] 高静：《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问题及其治理研究》，载《南亚研究季刊》2011年第3期，第67—73页；孟凡东、孔晨旭：《论印度现代化模式中的阻滞因素》，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29期，第242—243页。

[2] Ashok Kumbamu,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Gene Revolution’: The Case Study of Bt Cotton in India,”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Vol.17, No.4, 2006, pp.7-31; Preeti Pal, Ramachandra Gopal P and Ramkumar Maria Arputham,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ransport Policy*, Vol.130, No.1, 2023, pp.167-183; Grant Alan Burrier and Philip Hultquist, “Temples, Travesties, Or Something Else?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Hydroelectric Dam Construction in India,” *World Development*, December 2019, https://www.academia.edu/download/66166397/Burrier_and_Hultquist_2019_Temples_Travesties_or_Something_Else_World_Development.pdf.

[3] C. Sharmista, “Modernization In India,” *Journal of Art & Social Sciences*, Vol.1, No.2, 2016, pp.1-2.

[4] 严双伍、赵斌：《自反性与气候政治：一种批判理论的诠释》，载《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54—59页。

二、莫迪治下“印度式现代化”的气候政治叙事：国际与国内

（一）莫迪治下“印度式现代化”的国际气候政治叙事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式现代化”的国际气候政治叙事呈现“积极有为”图景，具体表现如下：

1. 气候外交更加积极灵活

印度的国际气候谈判立场取决于三个基本前提：一是全球变暖肇始于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二是印度人均能源消耗低，对温室气体存量责任小；三是印度急需推进现代化建设以弥补发展赤字，强制减排不符合气候政治公正。因此，印度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坚决反对作出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即使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COP15)、2010年坎昆气候大会(COP16)上，印度表态愿意采取自愿减排行动，并在促进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方面有务实表现，收获了一定的国际赞誉，但很快又回归传统强硬立场。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气候外交才真正变得更为积极灵活。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COP21)召开前夕，印度公开承诺其4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能源，此举被称赞是“为巴黎气候协议扫清了重大障碍”。^[1]会议期间，印度同法国发起“国际太阳能联盟”(ISA)，在开创可再生能源议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评价称“印度成功地完成了从‘规则阻碍者’到解决问题的‘规则制定者’转变”。^[2]2016年4月，《巴黎协定》开放签署，但生效还需达到“占全球排放量至少55%的55个国家批准”这

[1] Fiona Harvey, “India’s Pledge Clears a Significant Hurdle Towards a Climate Deal in Paris,” The Guardian, October 2,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5/oct/02/indias-pledge-clears-a-significant-hurdle-towards-a-climate-deal-in-paris>.

[2] W.P.S. Sidhu, “Looking Ahead: The Next 365 Days,” Brookings, June 5,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5/06/modi365_wps.pdf.

一“双重门槛”。^[1]同年10月，印度完成批约，无疑为协定的生效注入一针“强心剂”。2017年6月1日，时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协定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就此蒙上一层阴影。这一时期，印度重申对协定的政治支持，莫迪公开强调“在现实对立的世界中开展合作的必要性”^[2]，再次表示印度不逊于其他大国，期望成为国际关系议程的制定者。^[3]这些言论虽不乏一定的国家“利益”考量，但也表明印度已准备好在气候外交舞台发挥领导力。2021年是莫迪政府彰显其气候雄心的“高光时刻”，印度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COP26）上首次明确表示，至2030年将达成的一些中期目标和2070年达到“净零”的长期目标，助力全球气候治理迈上新台阶。值得一提的是，在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担任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期间，印度试图继续发挥在北方发达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作用，强调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并表现出积极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声的姿态。

2. 气候变化国际双多边合作成就瞩目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开始重新谋划气候外交，并通过战略性双多边伙伴关系取得了系列成就。在双边合作方面，印度已同多个国家缔结伙伴关系，开展双边气候合作。2018年，与法国发起“国际太阳能联盟”，在促进太阳能技术推广、为太阳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方面积极合作，吸引众多国家加入；2021年，与美国启动高级别“2030气候与清洁能源议程伙伴关系”，将沿着清洁能源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气候行动和融资动员对话这两个主要轨道进行，在未来十年的行动中就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双边合作；同年，

[1] “Key Aspect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UNFCCC, <https://unfccc.int/most-requested/key-aspects-of-the-paris-agreement>.

[2] “G-20 Summit: Norway PM Erna Solberg Gifts PM Modi a Symbolic Football,” The Indian Express, July 8, 2017,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norway-pm-erna-solberg-gifts-pm-narendra-modi-with-symbolic-football-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g-20-summit-4741536/>.

[3] Dhanasree Jayaram, “From ‘Spoiler’ to ‘Bridging Nation’: The Reshaping of India’s Climate Diplomacy,” *Revue Internationale et Stratégique*, Vol.109, No.1, 2018, pp.181-190.

与英国共同发布“2030 路线图”，通过印英森林伙伴关系、气候金融伙伴关系、绿色氢能伙伴关系、“绿色电网倡议”（The One Sun One World One Grid, OSOWOG）^[1]等共同引领全球气候行动；2022 年，与澳大利亚在第四次能源对话期间签署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意向书，就超低成本太阳能和清洁氢的制造和部署展开双边合作，推进低排放技术研发和共享，深化两国工业联系，释放新的经济机会。可见，莫迪政府积极博取西方发达国家在气候治理方面的支持，相关双边合作力度持续加大。

在多边合作方面，莫迪政府将气候议题嵌入经济技术合作与能源发展倡议中，并致力于提高灾害风险管理和气候变化适应能力。首先，积极开展邻国多边气候外交。如通过“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深化同南亚、东南亚成员国之间的能源合作，增强地区气候应变能力。^[2]其次，凭借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越战略地位，与该区域伙伴一起挖掘“蓝色经济”潜力，推行“蓝色外交”政策。印度同“环印度洋联盟”（IORA）、东盟等加强伙伴关系，借助“印度—太平洋倡议”（IPOI），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蓝碳^[3]生态系统、合作应对自然灾害和海上威胁。^[4]另外，莫迪政府在推进多边合作倡议方面颇有建树，发起“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关

[1] “绿色电网倡议”是一项旨在引入跨国电网，为全球提供电力的倡议。参见“Green Grids Initiative: One Sun, One World, One Grid,” Invest India, August 31, 2022, <https://www.investindia.gov.in/team-india-blogs/green-grids-initiative-one-sun-one-world-one-grid>。

[2] Madhura Joshi, “Strengthening Climate Diplomacy: An Imperative for Indian Climate in the New Decade,” ORF, April 26, 2021,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strengthening-climate-diplomacy-imperative-indian-climate-new-decade/>。

[3] “蓝色碳汇”或“海洋碳汇”，简称“蓝碳”，是利用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和储存。世界银行指出，红树林、海草和盐沼等蓝碳生态系统的碳捕获量超过森林，对其进行保护和修复，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参见“From Mangroves to Seagrass, Blue Carbon Ecosystems Are Critical to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The World Bank, November 21, 2023,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3/11/21/from-mangroves-to-seagrass-blue-carbon-ecosystems-are-critical-to-tackling-climate-change>。

[4] Rajiv Bhatia, “India’s Blue Economy and the Indo-Pacific’s Future,” Gateway House, July 28, 2022, <https://www.gatewayhouse.in/indias-blue-economy-and-the-indo-pacifics-future/>。

系基金”(India-UN Fund, 2017)、“抗灾基础设施联盟”(CDRI, 2019)、“弹性岛屿国家基础设施倡议”(IRIS, 2021)等多边平台,向各国家和地区提供技术、资金支持,以加强气候适应能力建设,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3. 对外气候援助力度增强

气候援助通常指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通过提供资金、技术等措施对气候变化脆弱性国家或地区施以援手,以提高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印度作为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展中大国,一直是获得气候援助最多的“受援国”之一。莫迪执政以来,通过提升对外气候援助在国家总体气候外交中的战略地位,逐步塑造自身气候“援助国”身份。综合来看,莫迪政府对外气候援助在援助范围、模式方面都展现了一定的雄心。

在援助范围方面,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对外气候援助在区域分布上形成以周边邻国为优先、以非洲国家为重点的基本格局,并逐步扩展至太平洋岛国、加勒比地区、拉丁美洲等国家或区域。对印度而言,欲成世界之领导者,必先成邻国之领导者,基于“邻国优先”和“东向行动”新外交政策导向,印度侧重同近邻不丹、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加强能源开发和经济合作,致力于应对自然灾害,对巴基斯坦^[1]、阿富汗^[2]等国也展现出愿意施援的姿态,因此布鲁金斯学会称印度为“邻里第一响应者”(The Neighborhood First Responder);除南亚邻国外,印度的大部分气候援助资金都流向了非洲发展中国家,通过印非峰会、“泛非电信网络”项目等,印度对非援助计划也在持续推进。此外,莫迪政府还通过举办如印度—太平洋岛屿合作论坛、印度—加勒比共同体领导人会议等进一步扩大对外援助范围。

[1] 参见 Shubhajit Roy, “Pakistan Floods: Modi Reaches Out, Talks on to Extend Aid,” The Indian Express, August 30, 2022,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pakistan-floods-modi-reaches-out-talks-on-to-extend-aid-8119695/>。

[2] 印度是阿富汗民主政府最大的援助提供者之一,塔利班第一政权垮台后,印度在2001—2021年间为阿富汗项目提供了近30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建造阿富汗的新议会大楼、高速公路、发电站和水坝,援助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教育和技能发展。参见 Ruchi Kumar, “Is Modi’s India cosying up to the Taliban?” Al Jazeera, December 1, 2023, <https://www.aljazeera.com/features/2023/12/1/is-modis-india-cosying-up-to-the-taliban>。

在援助模式方面，莫迪政府发挥印度在空间科学、信息技术、专家咨询方面的比较优势，偏好知识技术型“柔性援助”，着力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以印度对非洲气候援助为例，2015年，莫迪表示，为增强印非双方在清洁能源、可持续栖息地、公共交通和气候适应性农业方面的伙伴关系，印度5年内向非洲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信贷、6亿美元的无偿援助、5万个奖学金名额，并进一步扩大“泛非电信网络”项目^[1]，以弥补非洲国家在气象灾害监测、预报和预警方面的不足。印度还会同联合国在7个太平洋岛国建立了气候预警系统，以帮助这些国家提升应对气候灾害的能力。

（二）莫迪治下“印度式现代化”的国内气候政治叙事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式现代化”的国内气候政治叙事，与上述“积极有为”的国际叙事形成较大反差，主要表现如下：

1. 能源发展与实现脱碳目标两难

2015年，印度提交了第一份“国家自主贡献”（NDC，《巴黎协定》及其长期目标的核心）计划，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印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将达到国内发电总量的40%。在2021年10月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COP26）上，印度进一步更新了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承诺到207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然而，减少排放强度并不一定会导致绝对排放量减少，从印度的能源发展计划与行动看，似乎也与其脱碳目标相悖。具体而言，这种矛盾叙事外化为三个方面：

一是战略计划，莫迪政府设置的发展愿景表明印度正在大力推行煤炭经济。印度在2021年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宣布，将在2030年实现500吉瓦的清洁电力容量。但仅在一年之后，印度电力部门却表示将进一步增加煤炭产量，计划到2030年增加近56吉瓦的燃煤发电容量，在本世纪末将其燃煤发电规模扩大约四分之一。对此，印度电力部部长解释说，“必须

[1] “Text of PM’s Statement at the Third India-Africa Forum Summit,” The Hindu, October 29, 2015, <https://www.thehindu.com/news/resources/text-of-pms-statement-at-the-third-indiaafrica-forum-summit/article7817691.ece>.

优先考虑提供可靠的电力以刺激经济增长”。^[1]气候和能源经济学家南迪尼·达斯(Nandini Das)指出,印度正在发出“含混信号”,因为它“正在迅速扩大其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但同时也在增加煤炭消耗”。^[2]对比印度的国际承诺与国内发展计划可以发现,在设立可再生能源目标的同时提升煤炭目标似已成为印度政府的某种战略“特色”,这种战略是“印度式现代化”追求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平衡”的生动体现,实质是在推行有利于煤炭产业发展的政策计划。“气候行动追踪系统组织”(Climate Action Tracker)对印度气候目标和政策的最新分析认为,印度实施的气候行动“严重不足”,完全不符合《巴黎协定》设定的1.5°C气温目标。^[3]

二是财政支持,采取包括补贴、投资、贷款等在内的财政措施,对印度能源转型和“净零”排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ISD)2022年研究报告的分析,印度不仅对可再生能源的部署放缓,财政补贴也在2017—2021年期间下降了59%,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尽管印度政府一再声称要加大对清洁能源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快绿色转型,但2022年对化石燃料的财政补贴仍是清洁能源的4倍。^[4]对化石燃料的持续支持,与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不符。

三是行政监管,莫迪政府打破了1973年以来印度采矿业严格的国有垄断和监管限制,推动煤矿商业化和私有化。自2015年起,印度允许国内特定行业公司参与煤矿竞争性投标;2020年,莫迪政府完全放开对采矿业的

[1] “India May Boost Coal Power Fleet 25% by 2030 Amid Rising Demand,” *The Economic Times*, September 23, 2022,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industry/energy/power/india-may-boost-coal-power-fleet-25-by-2030-amid-rising-demand/articleshow/94394642.cms?from=mdr>.

[2] Shruti Menon, “Climate Change: What Emission Cuts Has India Promised?” BBC, November 7, 202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58922398>.

[3] 参见气候行动追踪组织网站, Climate Action Tracker, <https://climateactiontracker.org/countries/india/targets/>。

[4] Prateek Aggarwal et al., “Mapping India’s Energy Policy 2022: Aligning Support and Revenues with a Net-Zero Futur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y 2022, <https://www.iisd.org/system/files/2022-05/mapping-india-energy-policy-2022.pdf>.

行政管制，允许相关企业进行商业采矿作业和煤炭自由售卖。^[1]此举作为莫迪政府2020年“自力更生的印度”（Atmanirbhar Bharat）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名为减少进口依赖，实现“国家煤炭自力更生”^[2]，实则为满足本国的火力发电需求而重启煤炭生产和贸易。而且，莫迪政府已多次对一些位于生态和文化敏感地区的煤矿进行商业拍卖，其中包括（国大党领导的）前政府宣布“禁止进入”的印度中部部分地区，这类“生态倒退”其实也折射出在全球经济形势严峻（尤其是历经三年疫情）的背景下，莫迪政府对关乎印度国计民生重大需求的能源经济等领域的急切关注。

2. 基础设施建设引发环境争议和生态失衡

基础设施建设是“印度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莫迪政府执政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是其关注重点，包括电力、桥梁、水坝、道路和城市基础设施开发。2023年公布的印度2023—2024财年^[3]联邦预算通过了7个优先事项，其中使一些行业到达“最后一英里”与“基础设施与投资”分别位列第二、三位，印度政府宣布将投入122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费用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3%，几乎是2019—2020财年基建支出的3倍。目前印度已确定100个关键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用于港口、煤炭、钢铁和粮食行业“最后一英里”的互联互通，从而加快印度的经济发展。^[4]

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有助于连接印度的不同地区和市场，创造就业机会、扩大水电供应范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大面积基建及其运营因涉及土

[1] Arjun Srinivas, “The Uphill Climb to Liberalize Coal,” Mint, December 17, 2020, <https://www.livemint.com/industry/energy/the-uphill-climb-to-liberalize-coal-11603030207632.html>.

[2] Ashish Kothari, “No Atma, Lots of Nirbharta: The Socio-Ecological Bankruptcy of Modi’s Self-Reliance Stimulus,” The Wire, September 28, 2020, <https://thewire.in/government/india-atmanirbhar-economic-package-environment-coal-mining>.

[3] “财年”即财政年度，是指由国家法律规定的，总结财政收支和预算执行的年度起讫时间。印度采取跨年制，以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为一财年。参见普华永道网站，PwC, 14 December 2023, <https://taxsummaries.pwc.com/india/corporate/tax-administration>.

[4] “Infrastructure Sector in India Industry Report,” India Brand Equity Foundation, May 2023, https://www.ibef.org/download/1690790945_Infrastructure-May-2023.pdf.

地开发、能源使用、材料运输等环节，又可能造成碳排放的增加。2014年7月以来，印度已在其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包括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国家公园）批准了270多个基建项目。^[1] 包括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西高止山脉生态敏感区开展胡巴利—安科拉 (Hubbali-Ankola) 铁路、凯加 (Kaiga) 发电厂、沙拉瓦蒂 (Sharavathi) 抽水蓄能水力发电等大型基建项目，这些耗资巨大的项目将毁坏大量森林植被^[2]，破坏生态平衡，并将削弱相关地区的森林储碳、吸碳能力。无独有偶，2023年1月，印度里希甘加水电项目造成北阿坎德邦乔希马斯地区发生地面沉降，随后发生的大规模山体滑坡和洪水给当地社区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可见，印度依靠基建项目吸引投资、促进发展，但倘若以环境为代价，则必然危及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储备，也可能对地质条件和水文循环造成负效应，引发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加剧气候变化趋势。

3. 农业现代化存在多种环境问题

印度是一个农业经济体，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近四分之三的家庭依赖农业收入。鉴于此，莫迪领导的印人党政府采取许多举措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在财政支持方面，与辛格政府在2009—2014年的1210.82亿卢比拨款相比，莫迪政府于2014—2019年间针对农业和农民福利的拨款2116.94亿卢比，几乎翻了一番，创下对农业投资的历史新高。^[3] 在化肥生产方面，莫迪政府“双措并举”，一方面恢复已停产的老旧化肥厂，另一方

[1] Tish Sanghera and Disha Shetty, "India Is Ripping Apart Its Environment For Business," Article14, May 2, 2020, <https://article-14.com/post/how-india-is-ripping-apart-its-environment-for-business>.

[2] 据估计，胡巴利—安科拉 (Hubbali-Ankola) 铁路项目将毁坏596公顷的保护区和178325棵树木；凯加 (Kaiga) 发电厂将毁坏54公顷林地，砍伐800棵树木；沙拉瓦蒂 (Sharavathi) 抽水蓄能水电项目将毁坏沙拉瓦蒂狮尾猴保护区的150公顷林地。参见 Veena Poonacha, "Writing on the Wal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re Destroying Western Ghats," Down To Earth, October 27, 2020, <https://www.downtoearth.org.in/blog/wildlife-biodiversity/writing-on-the-wall-infrastructure-projects-are-destroying-western-ghats-73967>.

[3] "Modi Govt's Initiatives Empowering Farmers at Every Step," Narendra Modi, September 1, 2018, <https://www.narendramodi.in/from-sowing-to-selling-produce-modi-government-s-initiatives-empowering-farmers-at-every-step-541319>.

面投资建立新化肥厂，大幅增加尿素产量。在农业灌溉方面，2015年7月1日，由莫迪主持的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会议批准了“Pradhan Mantri Krishi Sinchayee Yojana”灌溉计划，其愿景是扩大农业灌溉的覆盖范围，提高用水效率，使“每一滴水能种出更多庄稼”。^[1]在莫迪政府农业政策的推动下，印度2017—2018年度的粮食产量增至2.8亿吨，创历史新高。^[2]莫迪表示2023—2024年度的农业愿景是农业与技术相结合，促进农业现代化，使农民长期获得综合收益。^[3]然而，现代农业本身对环境气候危机负有部分责任；再者，印度政府用来提高农业产量的“技术和改进措施”亦非环境友好型。仅从目前来看，印度农业现代化存在着多种气候变化隐患，或将增强温室效应，并可能引发生态破坏连锁反应。

首先，过量使用化肥。莫迪执政以来，通过扩大化肥产量、加大化肥进口、对农民发放化肥补贴等措施，进一步刺激了国内的化肥市场，导致化肥使用率居高不下。截至2022年，印度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化肥消费国、第三大化肥生产国和全球最大化肥原料进口国。^[4]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测，到2050年，印度的化肥使用率可能还会翻一番。^[5]然而，过度依赖化肥可能增加农业旱地转化为主要温室气体排放源的风险^[6]，进而引发更加频繁的热浪极端天气。2023年1—9月，印度86%的日子都遭遇了极端天气，

[1] 参见“About PMKSY,” PMKSY, <https://pmksy.gov.in/>。

[2] “India’s Foodgrain Output to Touch New Record of 284.83 Million Tonnes in 2017–18,” The Economic Times, August 28, 2018,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agriculture/indias-foodgrain-output-to-touch-new-record-of-284-83-mn-tonnes-in-2017-18/articleshow/65581228.cms?from=mdr>.

[3] 参见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 Farmers Welfare, 01 FEB 2023, <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IframePage.aspx?PRID=1895533>。

[4] “Fertilizer Sector: Crisis Demands Strengthening Domestic Production Through PSEs,” Indian PSU, June 5, 2022, <https://indianpsu.com/fertilizer-sector-crisis-demands-strengthening-domestic-production-through-psus/>.

[5] 数据来源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s://www.fao.org/faostat/zh/#country/100>。

[6] Shahid Iqbal et al., “Regenerative fertilization strategies for 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Consequences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global dryland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Vol.398, No.17, 2023, p.136650.

受影响农作物面积高达 184 万公顷。^[1]

其次，畜牧业无序排放。印度是全球牲畜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仅以牛养殖业为例，印度大约有 3.03 亿头牛，位居全球第一。研究显示，牛养殖是造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的农业来源，牛排放甲烷造成的大气变暖效应比二氧化碳要强 28 倍之多。在宗教文化影响之下，在印度饲养牛象征着身份与地位，食用牛肉是禁忌，这就造成印度养牛数量多、牛肉消费低、牛的寿命更长，导致更多甲烷排放。而印度的饲料转化、饲料氮肥使用和粪便管理效率严重低下^[2]，更加速了温室效应。应对措施方面，尽管莫迪政府先后出台了“国家沼气和粪肥管理方案”（NBMP）、“新国家沼气和有机肥料计划”（NNBMP），并于 2022 年建成了号称“亚洲最大的生物天然气工厂”，声称“要让印度城市变得清洁、无污染，朝着清洁能源的方向发展”，但全印度只有 14 座沼气工厂投入运行。^[3]综合来看，印度垃圾分类水平低下、沼气工厂基础设施昂贵、资本投入不足、担心沼气泄露等原因限制了畜牧业污染问题的有效解决。

最后，地下水位下降。以旁遮普邦为例，其每年为印度的国家粮食储备贡献了约 31% 的小麦和 21% 的大米^[4]，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邦。然而，由于 81% 的土地用于农业耕作，旁遮普邦对水利灌溉需求甚高且多依赖地

[1] “Climate India 2023: An assessment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Down To Earth, November 28, 2023, <https://www.cseindia.org/india-2023-extreme-weather-events-11973>.

[2] Yu Zhou et al., “Nitrogen Pollution from Cattle Production in India: A Review of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s,” *Th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Vol.160, No.1-2, 2022, pp.98-106.

[3] Aathira Perinchery, “Here’s Why the New Indore Bio-CNG Plant Is Likely to Succeed – Though Others Like it Haven’t,” *The Wire*, February 23, 2022, <https://thewire.in/environment/heres-why-the-new-indore-bio-cng-plant-is-likely-to-succeed-though-others-like-it-havent>.

[4] “Punjab Contributed 31% Wheat, 21% Rice to Country’s Food Reserves,” *The Times of India*, December 30, 2022,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chandigarh/state-contributed31-wheat-21-rice-to-countrys-food-reserves/articleshow/96610974.cms>.

下水,致使地下水位迅速下降。^[1]有研究发现,地下水位每下降1米,粮食产量就会减少8%、用水密集型作物产量减少9%、经济作物产量减少5%。^[2]此外,地下水位下降,或将加速土壤有机质转化速率,削弱土壤的碳汇功能^[3],对气候变化造成负面影响。

4. 限制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组织和个人

莫迪执政以来,对环保组织较为敏感。2014年5月,印度情报局向莫迪新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绿色和平组织、国际行动援助组织等非营利组织是“西方政府战略外交政策利益的工具”,拖延了印度发展,使GDP年增长率下降了2%~3%。^[4]随后,莫迪政府开展两方面行动,一方面放宽环境法律行政许可。从2014年9月开始,总理办公室下令对环境法规进行60多项修改,取消了对经济特区、投资区、港口的环境许可要求;限制法定专家评审委员会的权力;允许在森林中进行采矿和其他破坏性活动。^[5]另一方面,严厉对待从事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2014年12月,莫迪政府直接取缔了4个在印度开展活动的外国非政府环保组织^[6],并将矛头

[1] 其中旁遮普邦中部地区的情况最为糟糕:73个街区中有34个街区的地下水位下降超过20米深度,过去30年间地下水累计下降超过9米。参见Rongchen Liu, Anirban Sanyal and Nirvikar Singh, “Environmental Issues, Economic Policies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Punjab, India,” *Indian Public Policy Review*, Vol.2, No.2, 2020, pp.25-48。

[2] Sheetal Sekhri, “Missing Water: Agricultural Stress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Groundwater Depletion among Farmers in India,” IGC, 2011, <https://www.theigc.org/sites/default/files/2011/03/Sekhri-2011-Working-Paper.pdf>。

[3] 苏天燕等:《土壤碳循环对地下水位的响应研究进展》,载《中国沙漠》2020年第5期,第180—189页。

[4] Gerry Shih, Karishma Mehrotra and Anant Gupta, “India Cracks down on Critics of Coal,”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5,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3/06/05/india-coal-adani-modi-crackdown/>。

[5] Nitin Sethi, “PMO Ordered 60 Changes to Green Clearances, Environment Ministry Delivered on Most,” *Business Standard*, January 20, 2015,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economy-policy/pmo-ordered-60-changes-to-green-clearances-environment-ministry-delivered-on-most-115012001495_1.html。

[6] 被取缔的组织分别是:银行信息中心,负责监督世界银行集团的贷款计划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塞拉俱乐部是一个主流环保组织;350.org主要关注气候变化;Avaaz是人权和环境运动组织。参见Praful Bidwai, “Modi Government Cracks Down on Green NGOs,” *OpenDemocracy*, February 17, 2015,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openglobalrights-openpage/modi-government-cracks-down-on-green-ngos/>。

直指反对煤炭、核电项目以及转基因作物的环保团体。2015年9月，印度内政部吊销了绿色和平组织的“接受外国资金”许可证。2018年，印度青年气候活动家迪莎·拉维(Disha Ravi)在国内因支持农民气候变化抗议活动，被当局指控涉嫌“煽动叛乱”，入狱数月之久。^[1]2019年，绿色和平组织被印度政府指控“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被迫关停在印办事处，并将员工和业务减半。

2023年6月5日，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的世界环境日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宣称印度政府正在制定“非常明确的路线图”，以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2]事实上，莫迪政府的言行仍存在一些矛盾之处。先是当年4月，印度中央调查局(CBI)对著名环境律师里特威克·杜塔(Ritwick Dutta)及其运营的非营利性“森林与环境法律倡议组织”(LIFE)立案调查，指控其接受外国资金、阻止印度的煤炭开发项目，损害国家经济安全。^[3]当年7月，印度当局又撤销了顶级智库——政策研究中心(CPR)的免税资格和筹集外国资金的许可，理由是“该组织参与反对煤矿开发相关活动”。^[4]当前，莫迪政府对环保问题的“矛盾”做法仍在持续，一边鼓励研究人员、学生、公民分享可行性创新观念以实现“气候友好型转变”，一边给从事环保活动的组织和个人贴上“反发展”和“反国家”的标签，政府“矛盾”行为之真相，最终旨归显然是“印度式现代化”发展优先。

[1] Hannah Ellis-Petersen, “Disha Ravi: The Climate Activist Who Became the Face of India's Crackdown on Dissent,” *The Guardian*, February 17, 20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feb/18/disha-ravi-the-climate-activist-who-became-the-face-of-indias-crackdown-on-dissent>.

[2] “India Has ‘Clear Roadmap’ fo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Modi on World Environment Day,” *The Wire*, June 5, 2023, <https://thewire.in/government/india-has-clear-roadmap-for-environment-protection-modi-on-world-environment-day>.

[3] “CBI Books Noted Environmental Lawyer Ritwick Dutta for FCRA Violation,” *The Indian Express*, April 22, 2023,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cbi-books-environmental-lawyer-ritwick-dutta-fcra-violation-8569815/>.

[4] John Reed and Benjamin Parkin, “Modi Crackdown Leaves Top Indian Think-Tank Struggling,” *Financial Times*, July 23 2023, <https://www.ft.com/content/ee2b8b03-315b-4074-acac-173b8c2e7124>.

三、莫迪治下“印度式现代化”气候政治叙事的生成动因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气候政治之所以呈现国际、国内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其生成动因显然不仅在于应对气候变化本身，而关键在于维持长期执政的基本政治诉求之下，追求“印度式现代化”，逻辑关联在于印度气候治理让位于短期经济目标、借气候议题实现“领导性强国”战略目标。

（一）维持长期执政的基本政治诉求

莫迪执政古吉拉特邦期间带领该邦经济飞速发展，因此民众对他就任总理后的执政水平和印度发展前景有较高的期待。但莫迪领导的印人党也面临一定的执政考验：一方面，国内发展压力不容小觑。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始终难以挣脱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大、通胀高企、农业农民问题等“痛点”。印度2022—2023财年的通货膨胀率为5.1%，极端天气导致的农作物减产可能会使通胀率超过6%^[1]，气候变化带来的粮食短缺不仅可能造成社会问题，也将直接影响经济表现。此外，莫迪政府还需解决民众更为关心的能源、电力问题，确保供应稳定。^[2]另一方面，需要重塑大国形象以回应国内期待。在国际政治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势下，印度不能再满足于做一个被动的观察者^[3]，而需要创造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况且相对于较为复杂棘手的国内发展难题，显然（气候）外交行动更有助于印人党在响应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同时，展示外交成就、展现国际形象、重塑大国荣耀、激发民族认同、凸显执政“业绩”。

简言之，如何通过国内外行动维持经济持续繁荣发展，回应社会诉求、争取民众认可、获取广泛支持，从而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建构有利于

[1] Satoshi Iwaki and Ryosuke Hanada, “India’s Modi Angles for Third Term with Drastic Action on Inflation,” Nikkei Asia, August 10, 2023,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dia-s-Modi-angles-for-third-term-with-drastic-action-on-inflation>.

[2] Justin Worland, “The Climate Rifts Biden and Modi Couldn’t Heal,” Time, June 28, 2023, <https://time.com/6289126/the-climate-rifts-biden-and-modi-couldnt-heal/>.

[3] 葛红亮：《莫迪政府“东向行动政策”析论》，载《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第62—79页。

印人党主政掌权的“叙事”，并长期保持执政地位，是莫迪政府的基本政治诉求，也是形塑“印度式现代化”气候政治叙事的主要动因。

（二）气候治理让位于“印度式现代化”短期经济目标

脆弱的国内经济基础是印度气候政治国际与国内叙事割裂的重要原因。尽管莫迪政府出台并实施了多项改革措施，但印度失业率居高不下、产业结构发展失衡，“印度式现代化”经济增长任重道远。对莫迪政府而言，实现“印度式现代化”短期经济目标势在必行。

1. 提升经济增速是“印度式现代化”的优先事项

目前印度有大量人口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22 年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称，2005—2019 年 15 年间，印度约有 4.15 亿人摆脱了贫困，贫困发生率从 55% 下降到约 16%，但 2020 年印度仍以 2.289 亿贫困人口位居世界第一。^[1]大规模贫困人口严重制约了印度的经济增长。重压之下，只有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人民获得更多收入，政府才能调动更多资金用于改善道路、桥梁、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经济优先”理念下，以环境利益为导向的项目，如废物处理厂、废物回收和环境保护项目较少受到政府关注，而为公众提供就业、能够带来补贴和其他好处的大型项目，因之有助于当地政府打造出亮眼“政绩”则更能获得政府的资金、政策支持。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只有在政府、企业等理性自利的基础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才能实现共赢。^[2]因此，对印度政府而言，亟待通过有效平衡政治商业收益与环境绩效，借助政策、技术、社会参与和商业实践等力量或手段，使环境友好理念贯穿政治商业决策及执行全过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

2. 创造就业机会是“印度式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印度拥有 14 多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近 18%。与发达国家相比，印度

[1]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2022,” UNDP, October 17, 2022, <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hdp-document/2022mpireportenpdf.pdf>.

[2] Preeti Pal, Ramachandra Gopal P and Ramkumar Maria Arputham, “Impact of Transporta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ransport Policy*, Vol.130, No.1, 2023, pp.167–183.

人口结构年轻化，15—64岁的人占总人口67%，65岁以上人口仅占总人口6%，后者在美国为16%、在欧盟为20%、在日本为28%。^[1]这种人口结构一方面意味着印度养老负担相对不重，劳动力资源充裕，另一方面也要求印度政府每年需要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满足适龄人口的工作生活需求。麦肯锡咨询公司研究预测：到2030年，印度需要通过推动GDP快速增长来创造9000万至1.45亿个非农就业机会，从而吸纳6000万新工人、3000万从农业部门转型的农业工人，以及5500万可能加入正规劳动力队伍的妇女。^[2]

此外，印度还需要解决产业升级换代可能引发的失业。以能源转型为例，长期看，可再生能源行业扩张将带来新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点，但短期内可再生能源行业无法提供同传统能源部门数量相当的就业岗位，印度政府难以应对持续上升的失业率。目前印度煤炭行业大约有360万从业人员，可再生能源行业从业人员为11.2万（包括太阳能行业的8.6万人），平均每座火力发电厂至少可以雇用800多名员工，太阳能发电厂仅需5—6名员工。^[3]也就是说，印度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必须发展到目前规模的约30倍，才能创造出同化石燃料部门数量相当的就业岗位。再加上从煤炭行业转向清洁能源行业，需要对工人进行重新培训和技能转换，而印度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20—39岁的青壮年受过初中教育的比例在2020年仅达到61%，相当于中国1993年时的整体教育水平^[4]，大多数人在入门级培训和技能学习方面遭遇障碍，难以达到就业门槛，导致短期内失业率上升。

[1]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orld Bank, 2021,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2] Shirish Sankhe et al., “India’s Tuning Point: An Agenda for India’s Economic Growth,”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August 2020,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Featured%20Insights/India/Indias%20turning%20point%20An%20economic%20agenda%20to%20spur%20growth%20and%20jobs/MGI-Indias-turning-point-Executive-summary-August-2020-vFinal.pdf>.

[3] Anuradha Nagaraj and Roli Srivastava, “India’s Solar Energy Boom Fuels Local Struggle for Green Justice,” Context, February 15, 2022, <https://www.context.news/climate-justice/long-read/indias-solar-energy-boom-fuels-local-struggle-for-green-justice>.

[4] 李龙、贾墨晗、金光照：《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比较——基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视角的分析》，载《人口研究》2023年第3期，第49—62页。

总之，因失业问题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使印度政府继续依赖高碳能源，阻碍了可再生能源的部署，于是，印度或因“专注”解决就业问题，而在经济、能源转型方面行动不足，最终恐难以兑现减排承诺。

3. 刺激制造业发展是“印度式现代化”的关键目标

一般而言，现代化理论强调工业化对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因为工业化通常涉及制造业和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其中，制造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价值链，不仅可以起到带动就业、提高生产力、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还能为农业、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装备、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可以说，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不可跨越的阶段和基本动力。^[1]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包括金融、教育、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娱乐和旅游等领域的服务业才会逐渐崛起。但区别于常规现代化理论及范式，“印度式现代化”的演进模式并非以工业化为起点，而是得益于在信息技术和商业过程外包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功。“印度式现代化”首先发生在服务业，在英语语言优势、低成本劳动力、政府支持等因素加持之下，印度的服务业十分发达，2022 年其产值占 GDP 比重超过 50%。^[2]相反，印度第二产业发展严重不足，莫迪 2014 年上任之时，制造业仅占 GDP 总量的 15%。^[3]这种发展模式给“印度式现代化”带来了一些挑战：其一，产业结构不合理，就业水平不高。同第三产业服务业相比，制造业通常是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领域，发展不足的第二产业导致就业机会有限，尤其是在印度拥有大量技术水平较低年轻劳动力的情况下更加重了失业和贫困率。其二，经济脆弱性。过于依赖服务业加剧了印度国民经济的脆弱性，一旦出现如金融危机、贸易争端或疫情等国际经济变化或全球事件，这些风险可能重创印度国民经济。其三，非均衡发展问题。印度的服务业通常集中在大城市和城市中心地区，使得

[1] 陈峰君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南亚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5 页。

[2] 参见 Ministry of Finance, <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793804>。

[3] “Manufacturing Sector’s Share of GDP in India from 2010 to 2021,”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379872/india-manufacturing-as-a-share-of-gdp/>。

资源和人口向城市集聚，这种不平衡分布导致印度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从而拉大城乡差距。

可见，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补齐工业化这一经济结构短板是“印度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14年9月出台的“印度制造”计划，正是莫迪政府刺激制造业发展、寻求国民经济新增长点之执政诉求的集中体现，目标是将制造业对GDP的贡献提高到25%，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制造中心”。围绕该计划，莫迪政府采取了包括推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工业走廊、工业许可制度改革等一系列举措，以支持包括纺织、皮革、化学品、采矿、火电、建筑等大约25个部门的发展。这些部门发展本就是一个碳密集过程，加之莫迪政府进行的工业许可制度改革，为降低投资障碍、鼓励更多的制造业企业来印度投资和开展业务，简化了环境审批流程，这种环境监管的松懈也可能会对减排努力和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三）借气候议题实现“领导性强国”战略目标

印度自独立以来，致力于成为世界“有声有色的大国”，但囿于经济状况、治理能力和国际形势，印度的大国雄心一度只停留于战略层面，未成既定事实。莫迪上任后，使印度成为“领导性强国”的战略目标再次被提上议程。莫迪上台之际，恰好是《巴黎协定》诞生前后，应对气候变化始终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焦点议题。印度国际气候政治叙事图景，自然成了莫迪政府实现“领导性强国”战略目标的主渠道，以赢得更多权益。

首先，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和机制建设，争夺话语权，尽可能服务本国经济增长。后冷战时代，印度曾被视作一个有着全球大国雄心的“地区利维坦”。^[1]印度渴望成为国际规范的建立者、国际体系的塑造者。投射到气候外交领域，印度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套新的“气候政治身份”，即“表面让利”，看似正在放下一些关于“公平与正义的包袱”，实则以更

[1]“利维坦”原指《圣经》中的海怪，霍布斯用来指代“强大的国家”，这里旨在表达印度有成为地区及全球“领导性力量”的雄心。参见[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隐蔽的方式将经济利益“内化”于气候变化应对之中，从而摆脱“麻烦制造者”标签，以期争夺气候政治话语权，为本国发展赢得更大空间。

其次，提升国际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诚如美国建构主义理论家亚历山大·温特 (Alexander Wendt) 所言，社会关系建构认同和利益。^[1] 莫迪政府在自身气候治理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发展对外气候援助，实质是借此加强同受援国的联系，塑造受援国认知，从而为印度转向“领导者”角色、提升国际影响力增加筹码。

最后，为“印度式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莫迪政府一方面通过放开外国投资行政管制，简化审批手续，为外商投资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借助气候变化议题，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机制，加强与自然资源丰富、资金充裕、技术先进国家的合作。反过来看，印度的气候“雄心”确实有助于提振外国资本投资信心，从而为“印度式现代化”拓宽海外市场。

总体看来，莫迪治下国际、国内气候政治叙事生成，从现象上外化为二元叙事结构，本质则反映了“印度式现代化”国际叙事与国内行动间的协调困境。这种看似反差或矛盾的言行，远非“倒置的第二意象”“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所能简单概括。^[2] 其间，尤其是“印度式现代化”短期经济目标与气候治理的两难，既有莫迪政府舒缓执政压力与获取业绩之迫切性，又是“印度式现代化”与国家战略利益需求的真实写照。也需要看到，莫迪治下“(‘印度式现代化’)发展 vs. (气候)治理”二元对立，至少是《巴黎协定》诞生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新兴大国普遍面临的矛盾。因此，个中协调难题、经验比较，值得深刻反思和持续追踪。

四、莫迪治下“印度式现代化”气候政治叙事的全球效应及启示

莫迪治下“印度式现代化”气候政治国际国内双层叙事可能产生一些全

[1]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2, 1992, pp.394-395.

[2] 赵斌：《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基于双层互动的系统分析》，载《南亚研究》2013年第1期，第62—78页。

球效应，作为周边邻国且尤其在全球气候政治中与印度存在广泛“利益共容”的中国，有必要审慎研判相关影响，并尝试一点可能的现实或理论省思。

（一）可能的全球负效应及影响

气候变化本身的全球公共问题属性，客观上强化了主要相关行为体之间的共同命运感，更遑论同为大国且相邻的印度和中国。就目前来看，“印度式现代化”主导的国内气候政治现实，难免对印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造成“束缚”，或将影响印度“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履行、清洁能源的部署、损失与损害基金、气候适应框架的落实以及全球 1.5℃ 温控目标的实现。

其一，全球气候治理“第三条路”步履维艰。自《巴黎协定》诞生以来，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一大核心关注点，无非是《巴黎协定》的践行及其持久效力。正因如此，美国政府退出或重返《巴黎协定》，总能引发世界政治的连锁效应。^[1] 全球气候治理成效之检验，也一度化约为主权民族国家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如何“自下而上”地履行“国家自主贡献”。

然而，“印度式现代化”气候政治国内叙事呈现出来的图景，尤其印度气候治理让位于短期经济目标，此种负效应可能“外溢”，影响印度作为《巴黎协定》执行期主要新兴大国的地位期许，也给印度所在的新兴大国群体带来某种不必要的结构压力。这种压力或可从两方面解读：一是上文所述印度气候政治国际叙事，高调为《巴黎协定》赋能，但其国内气候政治叙事的反差，可能弱化国际社会对印度治理能力甚或大国形象的期许；二是早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逐步形成的“第三条路”，亦即区别于过往全球气候治理南北格局的新兴大国群体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事实上不论巴西、南非、印度还是中国，其国别气候治理能力、潜力、意愿、行动一旦发生重大变化，都可能冲击原本就较为松散的政治联合或非正式国际机制（如“基础四国”“金砖国家”等）。如此，需要重点关注的叙事衍生不限于新兴大国气候外交调整，而在于发展中国家群体参与全球气候治

[1] 赵斌、谢淑敏：《重返〈巴黎协定〉：美国拜登政府气候政治新变化》，载《和平与发展》2021年第3期，第37—58页。

理的立场分化，这有可能再度为美欧发达国家利用，引发新的全球气候政治博弈乱象。

其二，跨境气候风险效应。数据显示，2022年的气候变化使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出现破纪录热浪的可能性增加了100倍。^[1]如果说“印度式现代化”的短期经济目标追求，必然依靠高碳排放的传统燃料，由此可能加剧南亚地区气候变化，进而引发安全风险和国际冲突等连锁负效应。例如，印巴之间的水资源争端，近年又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干旱和洪水灾害，会使这两国间水资源监管更加困难。^[2]

一旦“印度式现代化”气候政治国内叙事外化为“消极怠工”、国内气候治理乏力，所引发的气候变化风险很可能波及中国喜马拉雅生态区域。近年莫迪政府加快喜马拉雅地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公路、铁路、机场和开发水电项目，但对这些项目并没有适当评估其生态环境影响。《巴黎协定》诞生及生效以来，印度境内喜马拉雅山西部自然生态系统的压力不降反升。^[3]更糟糕的是，在气候变化影响下该地区的冰川“正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融化”，将引发洪水、山体滑坡、雪崩以及农田被淹，导致粮食短缺。^[4]喜马拉雅山脉是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天然屏障，该地区的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格外敏感，如果莫迪政府难以协调“印度式现代化”（尤其是短期经济目标）和气候治理之间的关系，加剧喜马拉雅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则可能造成自然灾害传播，连锁效应将危及中国西南地区的农业产能、生态平衡和水资源管理等，衍生出经济和社会层面跨境风险和综合安全危机。

[1] “Climate Change Swells Odds of Record India, Pakistan Heatwaves,” BBC, May 18, 2022, <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61484697>.

[2] Betsy Joles, “Can India and Pakistan’s Historic Water Pact Endure?” FP, September 21,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9/21/india-pakistan-indus-waters-treaty-dispute-climate-change-flood-drought/>.

[3] Vindhya Prasad Tewari, Raj Kumar Verma and Klaus von Gadov, “Climate Change Effects in the Western Himalayan Ecosystems of India: Evidence and Strategies,” *Forest Ecosystems*, Vol.4, No.13, 2017, pp.13–21.

[4] Arshad R. Zargar, “Himalayan Glaciers Are Melting Faster Than Ever, And Scientists Say It’s ‘Going to Affect Us’ All,” CBS News, June 22, 2023, <https://www.cbsnews.com/news/himalaya-glaciers-melting-faster-study-warns-will-affect-us-all/>.

（二）可能的全球正效应及影响

短期目标驱动的印度气候政治叙事，固然会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负效应。但综观整体的“印度式现代化”气候政治国际、国内双层叙事，印度国际叙事内蕴的灵活气候外交也存在一定潜在的正效应。

莫迪执政以来，积极开展对外气候援助，在全球范围推广可再生能源，无疑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一些正能量。如积极发掘空间科学、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潜力，对外开展相关科学研究与合作，建立较为先进的气象监测系统，在帮助提升全球气候变化适应能力方面贡献良多；在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能源多样化，增加能源存储，渐趋成为全球优先事项之际，印度借助“国际太阳能联盟”“绿色电网倡议”，推广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议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生态资源利用及清洁能源转化的经验参考。考虑到2024年这一全球“超级大选年”，莫迪政府亦在追求第三期连任，印度近年通过灵活的气候外交，显然在为加速印度实现绿色转型而尽可能争取有利的外部资源和条件。2021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以来，碳中和成了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新的具体议题导向，印度灵活的气候外交，顺应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也倒逼印度国内绿色转型。2022年，莫迪政府随即调整碳预算以吸引气候融资，激励外资银行和外国资本投资绿色行业，推动税收制度改革和可持续绿色供应链发展。但寻求气候治理与“印度式现代化”长远发展之间的艰难平衡，自然离不开印度灵活气候外交之跬步，却从来都应当是一个渐进、持续的进程——这不仅限于莫迪治下绿色产业项目（如太阳能板和绿色氢能）的推进。

影响印度成为绿色产业强国的因素太多，如技术、资金条件，以及种姓制度、发展不平衡等，而莫迪政府的气候外交牌，除却为印人党政府寻求连任等现实国内政治考量，其外交方面，亦存在持续的双边、多边对话乃至合作空间，对中国而言，至少就印度对外气候援助的理念与实践，与中国绿色“一带一路”、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等倡议和平台存在对接的可能性。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与印度同为“金砖国家”“基础四国”、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在新

兴大国、发展中国家等集体身份维度有着太多相近叙事。鉴于此，观察印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向及其可能的影响，有望为中印未来在气候政治话语权、气候变化应对、低碳技术等方面的深层次合作找寻可能的空间，从而助力全球气候治理善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凝聚共识，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气候政治话语权

如上所述，以印度为引，不论其全球效应或多或少影响到中国，亦不论其间哪一层叙事嬗变，其背后本质关切或可能皆指向全球气候政治话语权。鉴于此，新时代中国仍可在国际传播和反馈方面因应。一方面，坚持公平正义，中国可望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携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通过科学、技术和媒体渠道传播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实践和成效，提升话语传播有效性，抢占国际道义制高点，鼓励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构建公平公正、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寻求合作共赢，中印应继续借助“基础四国”“金砖国家”等平台就全球气候政治的共同立场、利益诉求及相关细则进行磋商和协调，增进互信基础，凝聚最大共识，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发展经验，助力“印度式现代化”绿色转型，以切实可行的行动提升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全球气候政治话语权。

2. 共商共治，推动喜马拉雅地区生态环境保护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念。中国和印度同处于跨喜马拉雅生态区，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对于喜马拉雅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印双方应秉持尊崇自然之理念，携手同行落实自然保护。具体而言，中印两国可加强双边对话和协商，推进两国气象、水文、生态学等领域科学研究合作，共享科学数据和研究成果，为中印双方共同制定政策框架、开展联合行动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有必要加强两国公众参与，促进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推动以共商共治方式落实喜马拉雅地区生态环境保护。

3. 优势互补，推动中印低碳技术合作

新时代中国清洁低碳化进程加快，水电、风电、光伏、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等多项指标名列世界前茅，印度也在推进可再生能源议程方面表现突

出。中印同为农业大国、矿产资源大国，都有强劲的能源需求，存在低碳技术优势互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印两国可沿着具体的碳减排重点领域共同投入研发和创新，分享低碳技术成果，推动农业向绿色生产转型、工业向绿色制造转型、能源向清洁可持续转型，走出一条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的绿色现代化之路，助力建设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3年迪拜气候大会（COP28）之后的全球气候治理，仍面临各种不确定性挑战。莫迪治下印度气候政治之所以呈现国际国内双层叙事反差甚或割裂，其根源在于“印度式现代化”。不可否认，印度温室气体排放规模及其治理，事关《巴黎协定》乃至全球气候治理效度。“印度式现代化”的发生学语境及其历时性过程，倘若无法回应或尽力调和“发展 vs. 治理”的共时性难题，那么印度气候政治叙事内蕴的深层困境和关系紧张，仍可能反复。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大国，印度不能为保持短期内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而再次复刻西方式现代化模式。总之，破解全球气候治理的复杂困局，需要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有所作为，将气候治理现代化真正内化于“印度式现代化”征程，加强国内气候行动，积极开展国际气候合作，为推动全球气候政治发展、实现全球气候治理善治而作出应有贡献。

【收稿日期：2023-12-20】

【修回日期：2024-01-28】

（责任编辑：马燕冰）